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張德江揭示港優勢弱化引起關注 重發展抓機遇解矛盾輿論熱議

文平理

每周輿論動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前日在北京會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在逐漸顯現，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並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輿論認為，張德江的講話揭示出本港優勢正在不斷弱化的事實，反映中央對本港發展前景的關注和判斷，值得社會各界高度重視。輿論並認為，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紛紛推動經濟轉型，實現新發展之時，本港社會卻陷入無日無之的政治漩渦之中，將令本港競爭優勢不斷流失，累積更多深層次矛盾。輿論指出，香港社會應摒棄政爭內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充分利用好中央對本港的各項挺港措施，切實有效改善民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矛盾，讓香港再創輝煌。

張德江講話反映中央對香港前景關注

張德江在講話中肯定香港多年來經濟實現較快的發展，但同時也看到，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逐漸顯現出來。輿論普遍認為，張德江的講話權威地反映中央對香港前景的判斷，揭示了香港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明確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說明中央政府對於香港形勢了然於胸。香港城市大學專長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署副署長指出，「張德江曾任五年廣東省委書記，是中央的『港澳通』，也是中央對港政策最權威人士，……張德江把注意力放在經濟發展上，重申香港是經濟城市，只要經濟問題得到改善，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是貫徹中央一向的思路，過去鄧小平、江澤民、以至胡錦濤都是一貫這樣說，胡錦濤便多番表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推進民主。」

香港競爭弱化令人憂慮

張德江又指出，現在香港經濟發展，一些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受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香港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這應該引起香港各界高度警覺，認真思考。輿論認為，近年本港雖然仍然保持經濟增長，失業率也處於低水平，但不能掩飾經濟轉型緩慢、產業結構過分單一的弊端，加上周邊城市紛紛大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香港的優勢確實不斷減弱。輿論並引用數據指過去20年，香港的GDP增長平均為3.96%，新加坡同期的增長卻達到6.6%。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上漲至50123美元，比之香港的34200美元高出近一半。經濟學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也指出，「香港向來以物流及金融為經濟發展重心，但事實上，香港轉口貿易地位近年已受鹽田港、廣州

港等挑戰，近日碼頭工潮事件更進一步削弱其優勢地位，中央意識到不少港人仍然未有被內地及鄰近地區趕上，甚至超越的危機感，故此再次直接作出提醒，希望港人重回發展正軌」。有報章評論亦指，本港在回歸後連興建一條港珠澳大橋也拖拖拉拉，足足拖了十幾年才動工，各項基建與政策拖拖拉拉，坐失良機，就算有金山銀庫，最終也會坐食山崩。

重視發展、抓緊機遇、化解矛盾

張德江強調，香港應增強憂患意識，切實把握機遇，爭創新優勢，實現新發展，「應該抓住機遇，爭創新功，實現新發展。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地改善民生，否則，其它一切都是空談」。輿論認為，張德江的講話說明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關係，只有發展經濟，才能改善民生，才能逐步化解社會種種深層次矛盾。有分析亦指，香港過去深層次矛盾不斷累積，就是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產業發展不平衡，導致市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解決香港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根本之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發展是硬道理」乃中央觀察本港整體形勢後得出的結論，他慨嘆本港經濟發展及完善的法律制度本來遠遠領先內地，但近年在多個領域都已被內地追上，原因之一近十年「有啲嘢卡住隻腳」，原因是反對派經常揮動「民主」的指揮棒，將所有爭議都政治化。港區人大代表、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指出，香港作為經濟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當然首要聚焦發展經濟，特

別是香港擁有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最大優勢，他並寄語社會應該減少無謂爭拗，集中精力裝備好，為下一代謀發展。

須防政治爭拗拖垮香港

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張德江有關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的講話，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重視。輿論指出，張德江講話是再次提醒港人必須減少政治內耗，把焦點投放於經濟發展，改善民生。輿論並認為，港人不應再自己人打自己人，更不應對內地諸多猜忌、自我局限，應當在有爭議問題上互讓互諒，減少內耗，把握祖國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尋求新的經濟亮點及發展路向。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張德江發言「苦口婆心」，是對本港最近形勢提出忠告：「本港社會現時動不動就有抗爭，就像立法會『拉布』，有議員挾持、威脅政府；而『佔領中環』則是普選諮詢開始前已提出，『碼頭工潮』又有外國勢力介入，此等極不正常的情況，若果香港市民不加抵制，本港最終會坐吃山崩，經濟發展會被消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分析指，張德江是再次提醒港人必須減少政治內耗，「正如龜兔賽跑一樣，你不能寄望別人永遠行得比自己慢，如今內地發展猶如搭火箭般發達向前，香港人如果仍然自己打架，只花時間爭拗內耗，優勢很快會消失。」有報章社評更指出「張德江表面上說的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指的是政治和社會問題，尤其是『佔領中環』甚囂塵上、預算案拉布及碼頭工潮等泛政治化問題令中央憂心忡忡，不得不出聲示警，希望港人醒覺。」

反共反昏了頭 拉布喪失理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自反對派全力策動「佔領中環」以來，香港的政局亦進入了多事之秋。職工盟李卓人策動的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仍沒有平息跡象，行動甚至已變成「佔領中環」的翻版；在輿論上《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挑動兩地矛盾的抹黑、造謠報道已到了走火入魔地步，《蘋果日報》基本上已成為另一份《大紀元時報》；在立法會上政爭更是無日無之，整個議會都陷入內耗之中，特別是近日故意拖延四川地震撥款以及預算案拉布兩役，更將反對派的不堪面目暴露無遺。這說明反對派反共泯滅了人性，拉布喪失了理智，這確實是立法會的悲哀，也是香港社會的悲哀。

阻撓賑災令人齒冷

從政人士政見不同、立場各異是十分正常的事，在議會上唇槍舌劍以至互相攻訐也是屢見不鮮，不必大驚小怪。但有一些基本的底線不論是哪個黨派的議員都應該遵守：一是人道精神、一是行為須符合道德規範，否則議會只會變成一個血肉橫飛的鬥獸場，社會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反對派以反對派政府、反中央為立場，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卻不能因為反中的路線，就泯滅了人性道德，事事以反中為先。

早前四川再度爆發地震，造成嚴重傷亡，數以萬計的災民流離失所，香港市民都感同身受，期望能夠向災民施以援手，表達一點心意。按照慣例，每當內地發生災情，特區政府都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賑災，支援內地的救災工作，2008年震驚國際的汶川大地震如是，青海玉樹地震亦是如是。當年反對派議員也不會阻撓撥款，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社運連更是早早發動籌款支援災民。原因並非是說反對派改變了反中路線，而是政治選政治、人民選人民，天災受害的人民，港人對他們施以援手是應有之義，也是體現同胞之情。但現在反對派卻找來種種藉口去阻撓撥款，什麼不相信內地監察、擔心善款流入貪官手上，這些理由實在不值一駁，如果這些理由成立，那以後香港也不用再對外籌款了；又或是只可向全世界最清廉的國家捐款，這明顯是不合常識的。反對派阻撓撥款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反中反昏了腦，要製造兩地民眾的矛盾，將兩地推向對立的境地。而災民的安危卻並非他們關注的，這種泯滅人性的行為令人齒冷。

在反對派阻撓賑災撥款的同時，激進派的拉布戰也正在開打。目前立法會幾乎已陷入停頓的狀態，議員的精力都虛耗在無聊發言之中，立法會主席還要求議員專心聽其他議員的發言，這恐怕是曾主席的黑色幽默了。如果說拖延賑災是因為反對派的立場使然，但拉布預算案、令公務員薪金、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都不能如期發放，這究竟又是為了什麼呢？難道市民的福祉都成為了反對派反對的對象？難道因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就連長者多取一份津貼都不能給予。激進派議員這次拉布根本是沒有理據，也是罔顧市民福祉，將市民的利益作為政治籌碼。

拉布罔顧市民福祉

最令外界側目的是，激進派為了拉布，梁國雄竟然在會議期間指派助理或社運連人士，故意在會議目的電梯內將每層樓層都按一遍，令電梯不斷停頓，目的是導致議員未能準時出席會議製造流會，令拉布可以持續下去。然而，《議事規則》訂明，任何人阻止議員開會行為均屬刑事案件，梁國雄指使他人阻止議員出席，有關罪行人證物證俱在，已經可以作出檢控。立法會應維護自身尊嚴，追究相關人士的刑責。而事件也反映了梁國雄等拉布議員已經失去了理智，沒有了道德是非，罔顧了法紀規矩。但市民不禁會問，預算案真的是如此十惡不赦嗎？需要不惜犯法，不惜犧牲社會的利益將其拉倒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否則部分反對派人士也不會明確表示不會拉布。如此，拉布議員何以如此逆民意而行呢？

反對派議員近日的行徑，不但令立法會已經低落的民望雪上加霜，也暴露了這些議員的不堪面目。反共可以泯滅人性，拉布可以喪失理智，為了政治將基本的人性都棄之如敝屣，真的值得嗎？

特區政府管治中的問題及成因

孟樓

前特首曾蔭權在處理當年泰國因紅衫軍風波導致香港遊客無法及時返港問題時，遭致批評，有此經歷之後，後來在處理菲律賓歹徒劫持香港遊客事件時，就反應迅速，受到好評。這說明執政能力的提高非一蹴而就，而需要一個過程的磨練、一段時間的培育。

劉兆佳在《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一書中認為，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 1.新政權從來都沒有有一套經過深思熟慮而擬定的管治戰略來應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很多時候是處於見步行步，被動挨打狀態，導致管治權威受損。而且對於決策模式朝「自上而下」方向推進一事，無論在心理上、程序上、制度上或資源配置上均沒有作出足夠的應對。
- 2.特區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方面的優秀表現有目共睹，但領導班子在調動、統籌、協調和整合政府內部的人力和資源來落實政府的重大方針政策方面卻是問題不少。政府內部做不到的跨部門間的密切合作與協調。極大程度上依靠特首個人的政治判斷和能力，達不到通過集思廣益讓政府能夠通盤掌握和駕馭形勢的目標。
- 3.特區政府難以充分駕馭行政機關，在承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前提下未能充分利用行政資源以強化政府的管治能力及政治戰鬥力，同時在應對來自政府以外特別是立法會、政黨和媒體的政治挑戰也缺乏足夠的行政機制和資源。
- 4.無論在政府或在民間，公共政策的研究、發展和調整追不上客觀形勢的發展。港人訴求的改變和社會上政策共識的磨損都導致群眾的期望與政府的施政表現存在落差。

造成管治問題的三大成因

劉兆佳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是特區政府高層沒有成立一個經常性的專門進行政治分析、釐定政治策略、深入研究政策課題、制定重大和長遠方針政策的政治領導小組。二是習慣了「放任主義」、「積極不干涉」或「小政府、大市場」思維。三是領導班子一直未能與公務員隊伍建立緊密與互信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地位最好、權力最大的政務官群體。

但李彭廣博士在《香港管治困局的深層次因素》一文中卻獨闢蹊徑地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在50年不變原則下，香港主流社會認為把英治的殖民管治體制做某種邊際調整便可，無視「港人治港」所指出的政治和管治體制重新建構的必然性。但我們對於

英治時期的管治體制的客觀運作不掌握和缺乏認識，是造成回歸後香港管治困局的成因之一。就是這種「知識缺失」，致令在過去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有很多似是而非或未經充分論證的說法充斥香港社會。例如有一種想法，認為華人高官在港英時期位居要津，當知英國治港之道，以及英國管治殖民地的硬制度和軟組織。這種想法是認為從官員的個人為官經歷，便可得知所處職系或系統的運作詳情。須知道任何政府組織都屬科層組織，分工細緻，要身處下位者想知在上位的情況，以及從個人的經歷知道系統的運作邏輯，可說是極其困難的事情。何況在港英時期處於管制系統核心位置的職位是全數由英國官員包辦，直至英人撤離香港的前數年為止。諸如「以公務員為治港骨幹」等說法的背後，並沒有太堅實的研究作基礎，也不熟悉港英時期管治香港的基本體制，更不掌握從殖民地體制轉變為「港人治港」體制所需的條件和運作邏輯，因此未能洞察「英治香港」和「特區治港」在性質上的差別，並適時進行政治基礎建設和系統更新工程。

英國管治殖民地的骨幹官員，主要來自英國殖民地公務員。這支隊伍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在英國招聘、培訓、管理和調配的，並因應需要而派駐不同的殖民地。香港政府聘用英國（外籍）官員的總數，1959年只有1401名，1983年3269名，然後逐漸減至1997年回歸前夕的1249名，由「二戰」後至1970年為止，所有擔任香港政務職系最高職級的官員都是來自英國的官員。從1971年開始才有第一名本地官員擔任當時政務系統最高職級的甲級政務官；1973年在原本最高職級的甲級政務官之上增設司長職級後，也只有一名本地官員是屬於此職級官員；直至1985年才有第二名本地官員擔任此職級官員，佔總數（13名）的15.4%。在1990年代後期，由本地官員擔任司長級官員的數目才陸續增加。至1990年時，本地司長級官員有7名，佔總數的一半；最後在回歸前夕的1997年，本地司長級官員增加至15名，佔總數（17名）的88.2%。這些華裔官員是在英國撤離香港的最後一刻才被委以重任，晉身管治核心，但在英國官員長期領導之下，要突破政策執

行者的角色實有一定的難度。

「政府管治運作不變」是偽命題

除了派駐殖民地的管治團隊外，英國還在本土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輔助殖民地管治的支援系統，對殖民地政策和管制策略的制定起着重要作用。這個系統由兩部分組成：一以示負責和協調殖民地進行管制的殖民地部；二是負責研究殖民地問題和人員培育的大學和智囊機構。英國研究殖民地是19世紀中後期發展起來的，具有超過100多年的歷史。

隨著1997年的主權移交，便是管治香港的英國官員團隊的撤退和與英國本土管治支援系統的切斷。香港特區並沒有把英國官員的管制功能和管治支援系統在香港本土重新建立起來。需知道，1980年代或之後的治港公務員是以派駐在香港的英國官員為管治骨幹，而並不是在香港招聘並以行政為主的公務員（包括香港公務員中的政務官員）；而支援香港在地方進行管治的支援系統是設在英國本土，而不是植根於香港。換言之，香港的管治團隊和管治支援系統已被掏空。

因此，當我們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時，經濟方面的制度可以不變，但「政府管治運作不變」卻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特區政府並不了解港英時期的政府究竟是如何管治運作的。據聞曾蔭權說過，在港英時期，他每天上班走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傳真機有無來自倫敦的指令，有指令他就知道這一天該幹些甚麼，如果沒有傳真件，他就不知所措。港英時期英人掌握決策權，華人官員負責執行，華人官員缺乏決策實踐的鍛煉，欠缺決策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沒有決策權，就沒有深入社會各界、特別是落區調查研究的必要；就會形成只對上（英人）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識。中央政府對此早有發覺，在中英談判期間，曾向英方提出回歸過渡期設置一個有華人擔任的副總督，回歸後這個華人副總督可作為特首候選人，但此提議被英方一口拒絕。

由此我們就更理解陳弘毅教授所說的比「雙普選」更重要的可能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的提高問題。以中共那樣以「馬上得天下」、飽經風霜的執政者，尚且經過30餘年的艱難探索才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像特區政府這樣沒有經過艱苦奪取政權的過程磨難，沒有經過決策實踐的長期鍛煉，一夜之間就成了執政者，執政能力的欠缺實屬非常正常的事情。（本文轉載《成報》）

勿被偽議題絆跌普選夢

陳志豪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筆者始終相信，我們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毋庸置疑，政改一直是港人關注和爭議性最大的議題之一，多年來，政制發展絕非一片坦途；不過，我同樣看到了積極的一面，推進普選的力量是非常堅實的，當中的共識其實遠大於分歧。

政治口號 煽動市民

共識方面，《基本法》一早列明了，行政長官最終會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決定了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中央領導近年多番開腔，中央政府對香港於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香港各大政黨莫不以爭取落實普選為目標；香港社會的主流意願也是希望於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毫無疑問，各方面的意向是一致的，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由中央政府以至香港市民的共同奮鬥目標，也是最根本的共識。

爭議方面呢？不是沒有，但幾乎都是偽議題，實際上是沒有討論價值的。至今，仍有不少團體以向中央「爭取普選」為政治口號，煽動市民，究竟他們還在爭取什麼呢？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2007年決定香港的普選時間表，港人早已「成功爭取」了，現已到落實的階段，「民主派」繼續以「爭取普選」為政治口號，除了營造港人對中央的不滿情緒外，對真正推進普選又有什麼意義？

至於另一大爭議則在於「中央不能接受與其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其實是一個不應該爭議的議題。姑勿論此乃中央政府20多年來的一貫立場，依照《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向中央人民政府及特別行政區負責。簡言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央體制下的一部分，行政長官是中央體制下的一員，如參選者不接受這個體制，執意對抗中央政府，為什麼又要參選行政長官？孫中山可

會一邊策動推翻滿清皇朝，一邊要求滿清皇朝委任其為兩廣總督？一方面與中央政府對抗，另一方面參選行政長官，是違反政治倫理的，是政治上的自相矛盾。

擱下偽議題推進普選

「不能與中央對抗」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間是沒有衝突的。誠然，中央不會無限制地接受任何人擔任行政長官，但中央的底線真的很嚴苛和損及市民大眾的利益嗎？也不會。我們何必誇大中央底線的尺度和影響性，挑起社會分歧，分化市民呢？這對落實普選有幫助嗎？

經過許許多多人的努力，還差一步，港人便可以普選行政長官。終點前的最後衝刺往往是最關鍵的，無任何結果政制原地踏步更加壞，更令港人失望，現在是凝聚共識而非擴大分歧的時候，各政黨應展示最大的理性與誠意，擱下偽議題，分歧少一點，共識便多一點，香港就更靠近普選！